

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 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文献综述

李 卓 邹雨洋*

摘要: 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和人均收入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并没有完全照搬“华盛顿共识”,重蹈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覆辙。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政府干预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中国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应该采取不同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维持经济的稳健增长。基于“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关系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文献研究显示:针对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注重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协调关系,借助技术进步与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以解决发展中遭遇的瓶颈问题。

关键词: 工业化中期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

一、引言

与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阶段)问题有关的国外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库兹涅茨(Kuznets, 1971)经济增长理论、罗斯托(Rostow, 1959)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霍夫曼(Hoffmann, et al., 1958)的“四阶段论”和钱纳里(Chenery, 1955, 1960)的“六阶段论”。国内学术界根据国外有关理论,通过构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城市化率、就业结构等各种指标,来评估和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中国工业化发展所处的阶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陈佳贵 2007; 陈一鸣、全海清 2001; 王树华 2008; 周庆华 2011)。截至目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① 201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7.2 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10 年间增长 1.5 倍(相比于 2002 年)。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0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 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5 083 元,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由 2002 年的 1 135 美元上升至 2011 年的 5 432 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区间。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中国结合实际国情、借鉴国外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形成了日渐丰富、逐步完善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成果。但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依然面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旧问题,如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依然较低,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渐强化等等,而始于 2008 年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则使有关问题更为尖锐化、复杂化,迫切需要

* 李卓,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lizhuo@whu.edu.cn; 邹雨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zou1988yuyang@yahoo.com.cn。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招标项目“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0JZD0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工业化中期阶段典型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项目批准号:11JJD790030)的资助支持。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且细致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世纪实现新跨越,新征程谱写新篇章》,参见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bdcj/t20120815_402827873.htm, 2012-08-15。

我们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与隐忧,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政策措施。

世界各国(地区)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结构转化、能源资源消耗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借鉴工业化中期阶段典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后出现的新特征,及时调整策略、采取应对措施。而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势必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相应转变。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取得成功所采取的措施,可能对工业化中期出现的问题不再行之有效。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后续动力与可持续性,应该汲取不同发展战略的有效、适用成分,深入研究与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微妙关系,并在进行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中发挥政府辅助与引导的作用。

二、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成功经验

(一) 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讨论

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相比较;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等提法并无实质意义,中国的经济正是沿着西方市场经济的道路发展的,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与政策同“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一致。对于前者的观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一说较为典型。他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和积聚能量,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创新及按照自身特点和想法寻求发展的模式,值得其他国家效仿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Ramo 2004)。

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一方面是认同中国所展现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也是看到“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政策与措施的不足,并反思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发展模式。1990年由约翰·威廉姆逊(Williamson, 1990a, 1990b, 2000)针对有关拉美国家经济调整中已经采用和建议采用的政策主张进行总结,提出基于经济自由思想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因讨论有关问题的会议由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组织,而该机构的总部、美国财政部以及广泛参与拉美经济改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设在华盛顿,因此有关的共识意见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这一针对新兴拉美经济体完善经济发展战略的“策略清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财政赤字预算控制;公共开支应侧重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扩大税基,公平税率;金融业自由化,放开利率;统一的利于出口的外汇兑换率;国际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消除对外资限制,促进公平竞争;国有变私有;产业准入限制放松;私有产权保护。“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Stiglitz, 1998)。“华盛顿共识”自提出以来受到很多挑战,例如,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的危害在于形成了一种教条,其之所以被广为流传只是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可给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Stiglitz 2004)①。拉美经济的现实发展表明,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根本无法帮助有关国家摆脱发展停滞的困境。东欧转轨经济国家休克疗法的失败、亚洲金融危机中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政策上的失误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都使人们对“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

即便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且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不断遭到质疑,但是国内学术界对是否应该提出“北京共识”和在其基础上引申、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有关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提出让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中国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独特模式,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赵晓(2004)指出,相对于“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

①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有关学者,从策略重点来看,更关注贫困、收入分配和环境可持续增长等问题,但是,其基本的政策导向与“华盛顿共识”并非泾渭分明,因此也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但也有学者不认同“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提法。姚洋(2008)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年所创造的非凡成就并不意味着中国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建立市场制度的轨迹走的,中国在过去30年所追求的目标与“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经济政策相比几乎没有差距。黄亚生(2012)并不认同“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因为,无论从成功经验(东亚模式)或发展欠缺(拉美模式)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经济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于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基本的发展原则。虽然在围绕“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等概念提出的背景、原因以及所涉及的问题和范畴等展开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可以得到的唯一的基本共识则是目前尚无一个内涵明确的“中国模式”(俞可平、庄俊举 2004;俞可平 2009)。

(二) 国外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讨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关系,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核心分歧之一。而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作用及其与市场自由的关系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崇尚自由主义和充分竞争,主张资源配置全部由市场来进行,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范围内(赵宏 2009)。在成熟与自由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和劳动者的活力与动力得到充分释放,消费者的消费潜力也得到充分挖掘,美国形成了以人力资本、创新和研发、提高生产率为核心,主要依靠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曾铮 2011),为美国长期保持世界经济领先地位提供了稳固的支持。但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再次让这种令西方发达经济体引以为傲的经济发展模式遭受质疑:市场机制会有失灵的时候,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也需要反思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合理搭配问题。

东亚各国经济的成功崛起和拉美各国的经济增长停滞,都与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限制外国竞争,保护本国产业,形成了“外贸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跨入了成熟经济阶段的门槛(周茂清 2003;曾铮 2011)。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美国政策的影响下,拉美国家采取“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从而逐渐摆脱了“失去的十年”的阴影,形成了以发展资源加工工业为主和以发展出口加工装配工业为主的两种新的“生产专门化模式”(苏振兴 2003),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带来诸多缺陷:贸易逆差扩大、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对外资过度依赖、失业严重、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于1992年、1997年、1997年人均GDP超过或接近5000美元后,纷纷落入“拉美陷阱”,普遍出现金融危机、生态恶化、社会动荡、经济滞胀等现象,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停滞、经济安全受到冲击、基尼系数提高、社会治安恶化(陈彩娟 2009)。

通过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和照搬“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的对照,可以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上普遍存在结构性差异,因此,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新古典主义所坚称的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更加注重合理调配政府与市场两类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 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在3年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开始进入计划经济阶段。尽管计划经济体制一度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显著超过巴西、埃及、印度等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Morawetz, 1978),但是由于政府完全主导了经济决策、监督和实施,政府信息不充分和管理能力有限,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了监督实施的成本,使得计划经济的缺点凸显:非经济目标导向的政策、制度上的缺陷和激励机制的缺失,“政府失灵”的代价便是经济波动大、结构失衡、生产力停滞不前和低生产效率导致的资源浪费严重(Brandt and Rawski 2008)。

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围绕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改革,政府开始逐步减少对市场直接干预的范围和力度。首先,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

业生产的直接干预,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使得中国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并成为1978-1984年间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McMillan, et al., 1989; Lin, 1992);农业产出增长不仅为农村的工业发展提供动力(McKinnon, 1993),还助推了全国工业化的发展,为经济体的其他部门的企业创造需求(Qian and Xu, 1998)。随后,政府又通过对部分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定价实行“双轨制”(Dual Price System),降低对商品价格和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而这种市场导向的价格改革和对从价格变动中寻求利润的限制的部分解除,给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Brandt and Rawski, 2008)。至1992年,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观念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得到明确。

与此同时,政府减少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的改革措施,也面临一系列的阻碍和不确定性。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政府为化解阻力、降低不确定性的影响,将“分权式改革”和“地区改革试验”作为政府导入有关体制安排及政策举措的策略形式。中央政府通过“分权式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既为在局部地区进行改革试验创造条件,又为地方政府推进改革提供激励和动力。在“分权式改革”的基础上,“地区改革试验”既可以使改革在面临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阻力时先行进行试验(Xu, 2011),又可以降低改革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Qian and Xu, 1993)。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措施,为了突破阻力和降低风险,中央政府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随后批准在深圳、珠海等4市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吴敬琏, 2009),外资与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促进因素。

中国经济的改革经验表明:在将市场经济机制导入特定国家的改革试验中,应当充分考虑多样化政策(diverse policy)和制度路径(institutional paths)的重要性(Du, et al., 2006)。因为在不具备完全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制度基础情况下,激进式的(radical)改革将可能导致市场的混乱和原有组织的破坏(Murphy, et al., 1992)。因此,中国经济的改革采取的是逐步增量式的(incremental)改革(Kornai, 1992),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是逐渐减弱,其目的是使政府干预在改革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发挥积极的作用。Du等(2006)在对政府干预与中国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政府的积极干预行为不仅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也阻止了严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

三、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

(一) 主要问题

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收入(GNI)为衡量指标,对全球各国家和地区进行收入分组,从而区分各国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世界银行在2011年7月更新的收入分组标准中,将人均GNI在1 005美元以下的国家定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1 006~3 975美元的国家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在3 976~12 27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12 275美元及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其基本涵义是:一个经济体在人均GDP突破1 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将迅速向1 000美元至3 000美元的“起飞阶段”过渡;但是,一旦进入到人均GDP 3 000美元的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和矛盾将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难以克服自身矛盾、或者因发展战略失误以及遭遇外部冲击等影响,致使经济增长回落、经济发展出现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国内学者围绕“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讨论密切相关。人均收入是衡量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人均收入水平的停滞不前则是“中等收入陷阱”最直接的表现之一。蔡昉(2008)认为人均收入水平之所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主要是因为某种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在新阶段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促进作用也被其他制约因素抵消。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地方政府对GDP盲目崇拜以及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却制约经济和收入水平继续提高。在“分权式改革”中,为了激励地方之间开展经济增长竞赛,GDP成为了衡量地方政府绩效的主要量化指标(王永钦等, 2007),因此也容易形成“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过度依赖要素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

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产生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等阻碍经济增长的影响(蔡昉 2008)。Du 等(2012a 2012b)认为中国当前以分权式改革为基础的分税体制与官员考核制度,使得地方政府为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而盲目采取一种以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优先的赶超战略(Overtaking Strategy),使得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不平衡,进而导致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剩的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因此,只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才能实现由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胡鞍钢(2010)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所以应该转变 GDP 盲目崇拜和“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加快经济社会转型,谨慎地选择变革方式,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和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和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郭熙保(2011)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讨论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应该从过去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转变到增长与公平的发展战略,从投资驱动发展战略转变到投资与消费双驱动发展战略。而影响这些转型与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积极、有效和及时发挥资源配置功能(马岩 2009)。

(二) 战略选择

要解决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需要深入思考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把握怎样的力度和范围、以何种战略和政策措施对市场进行干预,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显示: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应该以一种集约式的发展战略或经济发展思路,在进行干预的过程中采取与强势主导所不同的辅助和引导的策略,尤其是在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上,促使中国经济增长逐渐减少对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遵循以比较优势为主的发展战略

Lin(2003)将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分为违背比较优势(CAD)和遵循比较优势(CAF)两大发展战略,从结合企业自生能力的角度,为欠发达国家(LDCs)在缩小与发达国家(DCs)间的差距、实现经济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提供解释。他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它们依据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诱导企业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其在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企业获得自生能力,经济也获得竞争力,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为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至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基础。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需要较高的成本来弥补与此相伴随的低效率。如果一国可以动用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较多,则其经济发展尚可以承受较高的成本。但是对于经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来说,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不可持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发展初期也尝试过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tch-up strategy),即政府通过人为地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扶持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对其中的企业给予保护和补贴,希望快速地实现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但是都因为受保护企业竞争力的缺乏、对有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以及由此导致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衡等问题而被迫放弃。中国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动员稀缺资源支持重工业发展,尽管工业体系得以基本建立,但是也付出了包括经济结构扭曲和经济效率低下等许多代价(韩树明 2003)。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贸易中,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也得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尽管从总体上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收入也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各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结构也存在差异,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赶超,忽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赶超战略(包括发展房地产战略)(Du et al. 2012a 2012b),由于其要素结构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发展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林毅夫、孙希芳 2003)。因此,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干预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仍然应该坚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从而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使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2. 进一步协调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相互搭配

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重点需要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结构刚性而导致

“市场失灵”然而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政府失灵”的后果甚至比“市场失灵”更严重。由此,传统上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对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两者取其一”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互斥的,而应该相互补充。在反思“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失败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政府的角色不应定位成“超然政府”(Autonomous Government)——仅仅以维护宏观稳定为终极目标,政策工具限于造成扭曲较小的补贴或者“庇古税”(Pigovian Taxes)等。政府应该与市场私人部门有更多的互动,融入(embedded)到连接政府与市场的社会纽带,除了 in 发展战略与方向上进行规划,政府还应关注私人部门行为主体的诉求。因此,在工业化转型或发展时期,只有既融入又超然的政府,才是非掠夺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Evans,1995),才能成为对私人部门有帮助的政府(facilitating state)(Lin,2011)。

然而,政府对私人部门或企业的帮助,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即鼓励企业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选择其产业和技术并为其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或补贴(Lin,2003)。否则,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不断地、大量地为其损失要求政府补偿,这样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状况和效率得不到改善,政府也不得不付出了远高于政策性负担所支付的成本。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政府过多地关注和参与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极易产生腐败、滋生“裙带资本主义”(cronyism)(Wade,1998;Stiglitz,2001),尤其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了各种相对优势的产业或部门,政府就可能被强势的私人利益部门捕获(Grossman and Helpman,1996;Engerman and Sokoloff,1994)。为了避免政府被利益集团所捕获,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关注的重点不应放在特定的产业或部门上,而应放在有利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具体活动中,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利益集团捕获(Rodrik,2004)。这种策略倾向显著地有别于传统结构主义发展战略,因为不管是出口鼓励型战略还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政府都有明确的关注和支持重点。因此,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导向也应该考虑改变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策略倾向,更多地关注战略措施的过程(specifying the process)或具体经济活动,而不应过于关注战略措施的结果(specifying the outcome)。

3. 技术进步与创新

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技术具有其特殊性。企业对在研发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可以分为特殊类技术与一般类技术两种(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特殊类技术是与某种专门而具体的产品有关的知识,类似于 know-how 知识,这种特殊类技术往往是企业专有的、排他的、隐性的(tacit),企业可以通过专利等法律手段和保密手段来保证获得对这种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收益。而一般类技术则类似于在某一行业进行普通产品生产的技术,企业难以控制这种技术知识的扩散,因此一般类技术具有部分非排他性,创新收益很难被创新企业完全获得,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即类似于 know-what 知识。由于技术进步与创新过程产生的技术具有不同特征,Grossman 和 Helpman(1991)认为技术的溢出(spill over)可以使得后来者能以更少的资源(更低的创新成本)实现技术突破,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可以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研发创新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动力(Romer,1986;Lucas,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4)。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存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使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并向发达国家收敛,就应通过技术变迁与创新来实现。适宜性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理论认为技术受制于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往往需要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积累。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可以通过政府提升本国储蓄率而人为地改变,从而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结构相适宜、相匹配,由此促进经济快速增长(Basu and Weil,1998)。

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进步与创新是化解当前经济发展约束、摆脱困境进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简单地通过人为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以迎合发达国家的最先进技术,希望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作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手段,似乎有些因果倒置。依据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这种强行引入的技术变迁最终会因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引起一系列经济问题,反而阻碍经济增长(林毅夫、张鹏飞,2005)。因此技术变迁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依据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来选择现阶段最适宜的技术进行研发或引进,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提升,逐渐完成技术变迁以实现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提升。

中国在进行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过程中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有助于解决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首先,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创新企业进行补贴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创新活动风险很大、失败率也很高。第一个尝试技术进步与研发创新的企业既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其成本或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以及其对其他企业的外部性),需要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或补贴来补偿,以减弱或避免因负的外部性问题而影响经济体系中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Lin 2003)。如果能够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获得政府扶植和补贴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可以减少政府补贴的直接和间接成本。

其次,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还可以降低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的创新活动不仅是发现和创造新知识、新技术的问题,也表现为通过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寻找成本尽可能低、效益尽可能高的生产组织形式或配置模式(林毅夫 2003)。这种引进、吸收、改进与再创造显然是有成本的,这其中就包括向发达国家购买专利的成本。当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并非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但却是最适宜的(所引进的技术结构与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因此,引进技术的成本就会因为引进技术与前沿技术差距较大而降低(若所引进的技术的专利保护已过期,则成本可能无需支付)(林毅夫、张鹏飞 2005)。

此外,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有助于缓解“潮涌现象”及产能过剩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时,往往更容易出现“潮涌现象”及产能过剩的问题,以至于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林毅夫 2007)。当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沿着世界产业链由低往高逐步升级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于经济中哪一个既是新又有前景的产业容易形成共识,于是资金便如同潮涌一般投向同一个一致被看好的产业,导致产能过剩。如果在产业升级时遵循比较优势,那么企业在具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会更多地依靠自有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来进行投资(Lin 2003),从而更审慎地作出投资的选择,即使投资回报没有达到预期,偿还贷款的能力也会比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强,因此企业亏损、银行坏账等不良后果也不会过于严重。

四、结论

中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此,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展开积极讨论。概括地说,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和利用了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仍处在不断摸索中。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国内对“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关注重点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重点相似,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均建议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等策略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此同时,解决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探索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需要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同时发挥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更多地倚重技术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其中,是否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决定政府干预和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否以及成本大小。

一方面,政府应保持一种既“超然”又“融入”的状态,在“融入”的同时又不能被“捕获”,因此政府要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鼓励和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并把相关政策与战略措施的重点定位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具体活动和过程上。由此,政府发挥了干预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企业也能获得竞争力。另一方面,进行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应该基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从而降低“潮涌现象”和产能过剩的发生概率,减少政府因扶植和补贴本国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引进技术的成本,更好地发挥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的推动作用,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蔡昉 2008 《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
2. 陈彩娟 2009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经济纵横》第10期。

3. 陈佳贵 2007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陈一鸣、全海涛 2007 《试划分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问题探索》第 11 期。
5. 郭熙保 2011 《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变》，《当代财经》第 3 期。
6. 韩树明 2003 《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比较与思考》，《当代经济研究》第 4 期。
7. 胡鞍钢 2010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代经济》第 15 期。
8. 黄亚生 2012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基于中国、印度、巴西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9. 林毅夫 2003 《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第 58 期。
10. 林毅夫 2007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研究》第 1 期。
11. 林毅夫、孙希芳 2003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兼评〈对外开放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评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3028。
12. 林毅夫、张鹏飞 2005 《适宜技术、技术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5004。
13. 马岩 2009 《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经济学动态》第 7 期。
14. 苏振兴 2003 《拉美国家关于新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拉丁美洲研究》第 3 期。
15. 王树华 2008 《关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评估》，《商业时代》第 29 期。
16.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 2007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第 1 期。
17. 吴敬琏 2009 《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5 期。
18. 姚洋 2008 《华盛顿共识没有过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http://www.nsd.edu.cn/article.asp?articleid=7126>)。
19. 俞可平 2009 《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人民论坛》第 18 期。
20. 俞可平、庄俊举 2004 《热话题与冷思考(三十四)——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 5 期。
21. 曾铮 2011 《四类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中国市场》第 11 期。
22. 赵宏 2009 《中国模式与当今世界几种主要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红旗文稿》第 22 期。
23. 赵晓 2004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周刊》第 33 期。
24. 周茂清 2003 《工业化过程中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第 6 期。
25. 周庆华 2011 《本世纪初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研究导刊》第 27 期。
26. Atkinson A. B. and J. E. Stiglitz. 1969. “A New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Economic Journal* 79(315): 573–578.
27. Basu S. and D. N. Weil. 1998. “Appropriate Technology and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4): 1025–1054.
28. Brandt L. and T. G. Rawski.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 Chenery H. B. 1955. “The Rol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ment Progra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2): 40–57.
30. Chenery H. B. 1960.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4): 624–654.
31. Du Julian, Hongsheng Fang and Xiangrong Jin. 2012a. “Understanding the Biased Primary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n China.”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n Russia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32. Du Julian, Hongsheng Fang and Xiangrong Jin. 2012b, “Promotion Tournament, Tax – Sharing System Reform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Ural Federal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s://urfu.ru/fileadmin/user_upload/gsem/Julan_Du_Hongsheng_Fang_Xiangrong_jin.doc.
33. Du Julian, Yi Lu and Zhigang Tao. 2006. “Governments’ Helping Hand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Evidences from China’s Private Sector.”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vailable at <http://en.ccer.edu.cn/download/6269-1.pdf>.
34. Engerman S. L. and K. L. Sokoloff. 1994.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s 0066.
35. Evans P. B.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6.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7.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4. “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1): 23–44.
38.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6.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3(2): 265–286.
39. Hoffmann W. G., W. O. Henderson and W. H. Chaloner. 1958.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Manchester, E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40.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Kuznets S. S. 1971.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2. Lin J. Y.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 34–51.
43. Lin J. Y. 2003.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2): 276–308.

44. Lin J. Y. 2011.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197.
45. Lucas R. E. Jr. 1990.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2) : 92 – 96.
46. McKinnon R. 1993.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7. McMillan J. J. Whalley ,and L. Zhu. 1989.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4) : 781 – 807.
48. Morawetz D. 1978. *Twenty – Five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50 to 197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9. Murphy K. M.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92.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3) 899 – 906.
50. Qian Y. and C. Xu. 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 – 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 – State Sector. "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2) : 135 – 170.
51. Qian Y. and C. Xu. 1998. "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65(1) : 151 – 164.
52. Ramo J. C.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53. Rodrik D. 2004.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4767.
54.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 Run Growth.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 1002 – 1037.
55. Rostow W. W. 1959.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2(1) : 1 – 16.
56. Stiglitz J. E. 1998.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Prebisch Lecture at UNCTAD ,Geneva: World Bank. Available at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NEWS/Resources/prebisch98.pdf>.
57. Stiglitz J. E. 2001. "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 Lessons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 " In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 Miracle* ed. Joseph E. Stiglitz and Shahid Yusuf 509 – 526.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58. Stiglitz J. E. 2004.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 The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Working Papers ,Columbia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policydialogue.org/files/events/Stiglitz_Post_Washington_Consensus_Paper.pdf.
59. Wade R. 1998. "From 'Miracle' to 'Cronyism': Explaining the Great Asian Slump. "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2(6) : 693 – 706.
60. Williamson J. 1990a. *The Progress of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 C.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1. Williamson J. 1990b.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ed. John Williamson 7 – 20. Washington D. C. :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2. Williamson J. 2000. "What Should the World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 15(2) : 251 – 264.
63. Xu C.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 1076 – 1151.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in the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Literature Review

Li Zhuo¹ and Zou Yuyang²

(1.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Entering the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aching upper – middle – income level ar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id not follow the track of Latin Americ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completely copied "Washington Consensus". Instead ,China's market oriented reform was gradual and incremental ,during which the impacts of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ere positive. Stepping into the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i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invok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ifferent to thos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so as to sustain a robust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mechanism" ,survey of literature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suggested that in view of primar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 China should apply Comparative Advantage – Following Strategy and focus on how to coordinate government intermediation with market mechanism and maintain sustainable dynamic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lve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technology advanc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Comparative Advantage – Following Strategy

JEL Classification: O1 ,O2 ,O3 ,O5

(责任编辑: 孙永平)